

現當代文學研究概述

劉淑貞

一、前言

綜觀2014年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和往年相較，是一個較為特別的年份。這一年的上半年，台灣學界乃至整個文化界幾乎都籠罩在太陽花學運的衝擊之中。能見度較高的論述幾乎都與學運的反思與檢討有關。這些論述發表的平台也有別於過往侷限在專書、期刊等體制內的刊物，轉移向更具影響力的網路平台，如個人臉書、公共論壇等網站。相對地，這一年也是專書出版較為沉寂的一年。多數的研究成果，仍以期刊論文為主要發表平台。其中包括區域文學、殖民論述、女性議題、離散與空間研究，以及文學批評等，都有質地精良的論述產出。以下就2014年度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幾個較受關注的研究議題進行概述介紹。

二、學運：在台灣文學研究的教室現場

要談2014年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太陽花學運是一個難以忽略的「在場證明」。它與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不一定存在著直接的關聯性與生產性，但它所指涉的問題，卻與整個台灣文學文化生產結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學運期間，許多台文系的老師直接宣布停課，教室改換到街頭運動的現場。對2014年的許多台灣文學研究者而言，它不但是一個「正在發生中」的文本，也在某種

意義上標誌出作為研究者的自己，腳下所踩踏的一方位置／土地。

太陽花學運所帶來的衝擊不必然是發生在學術研究的體制之內的，卻對學院本身產生了更大的效應與反思，對近年漸顯疲態的台灣文學界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激活。它趨使整個台灣文學研究場域在2014年這個當下——面對經濟強勢的中國，與愈趨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台灣社會，以及隨之愈被資本社會吞噬消沒的「台灣主體性」——這些至關台灣文學研究場域最為本質性的命題，究竟該展現什麼樣的學術能量與態度？這些當前的情境，事實上是2000年左右循政治力量進入體制內的「台灣文學」，無可迴避的困局。因此，2014年對許多台灣文學界的學者而言，是化論述為實踐的一年——儘管實踐的程度與方式有別。除了支援學運等行動，如吳叡人、陳芳明、楊翠、魏貽君等長期在台灣文學或文化場域上活躍的學者，都以實質的行動參與了學運；在運動告一段落後，由各方學者對學運本身所展開的檢討與反思，也激盪出了近年來少見的思想能量。

社會學界對此的討論尤多，《思想》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皆有專號討論之。而趙剛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5期（1月）的〈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嘗試在統獨、反中與美國因素的脈絡底下，重新爬梳「反服貿」運動

背後的社會文化與知識地景，是其中觀點與討論皆較為獨特、也備受爭論的一篇。按照趙剛的說法，「太陽花運動」有其自2008年野草莓學運以來、社運與台獨路線漸次合一的積累，而「中國」是整個學運過程中最大的「興奮點」。這個觀點固然有待更為細緻的討論，文中的許多論點也顯得過於果斷。此文在2015年持續引發劉紀蕙教授等人的討論，雙方也因此形成論戰態勢¹。趙剛將論述主力放在台獨陣線長期以來的發展脈絡，與台灣政治社會發展中各階段的文化景觀，彼此形構了運動過程中的一種激發與能量，其推論的立基與方法固然有其左傾理念的立場，然而作為2014年的台灣文學研究現場，趙剛的論點其實仍有其提點的效力存在。它隱晦地從旁為我們提點出台灣文學近幾年來的研究困境，也仍在本土化理念與全球化資本主義浪潮的拍擊中拉鋸。而「中國」因素在過去作為「台灣主體性」的對立面，在2014的今天，它早已悄悄置換了昔日民族主義本位的位置，和資本主義進行結盟。台灣文學過去所主張的「主體性」理念，在面對「中國」這一隱形「他者」的位置、身分丕變，自應產生策略或方法上的革新，才能提出全新的論述方法。

總的來說，太陽花運動所勾連挾帶的幾個隱伏在台灣文學研究場域內部的問題，如本土性、全球化資本主義浪潮、中國勢力等，各種發生於當下、且常是瞬息丕變的概念，都讓近幾年來面臨學科體制不斷內縮等問題的台灣文學界，產生一定程度的反思。

1 劉紀蕙，〈劉紀蕙與趙剛商榷：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中國」理念〉，破土，<http://groundbreaking.tw/wordpress/archives/233>，2015.06.24。

而在體制內對太陽花效應最為務實的思考的，應是林運鴻所寫的〈失落的台灣文學系所：沒有民族主義花園的文化園丁〉²一篇。此文從整個台灣文學的學科創建體制、實務範疇來思考台灣文學近年來的困境。林運鴻認為：從野草莓到太陽花運動期間，台灣年輕世代對「台灣主體性」的熱度持續升高，然而體制內的「台灣文學系所」的報考人數卻逐年下降，這與整個國家在朝向一成熟的「民族國家」建成的過程，未能完全在教育、產業、文化等各方面，進行一種同步的轉型有關。林文指出，在本土政黨執政的八年間，本土化教育並未真正產生一種語文教育現場上的優位性，雖然使用台灣文學史、台灣文學、母語等教材，然而因本土化浪潮而進入體制內的台灣文學系所，所培養的學科人才，卻並未真正能循體制進入到基礎教育的現場，而導致台灣文學只能是一種未能往下循環的「菁英教育」，畢業生只能是一群「沒有花園」的園丁，是一種「沒有克服中文系再生產結構的本土化」。

這篇短文為從2014年這一時間點往前與往後各自瞻看的台灣文學研究，提出了一個既在學科之內（因此它既是概念式的）、同時也在學科之外（同時也是實務式的）的問號——它所歸結的，仍是那樣一個老調重彈、卻亦是當務之急的問題：即「台灣文學」如何可能？「台灣文學」還能再是什麼？在學運場上的台灣文學教室裡，我們能從這個「現場」得到什麼樣的啟發、方法與

2 林運鴻，〈失落的台灣文學系所：沒有民族主義花園的文化園丁〉，想想論壇，<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2301>（上，2014.08.03）、<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2303>（下，2014.08.04）。

道途？恐怕才是「後太陽花時代」台灣文學研究最沉重的問題。

三、全球化浪潮下的區域文學研究

全球化風潮與經濟體持續席捲世界。作家的移居、遷徙，隨著高度資本主義化時代的來臨，地方性的痕跡逐漸消弭。從2000年迄今，本土化、離散、全球化等命題都曾是台灣文學學界關注的焦點。而2014年，「區域文學」的研究主題則成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焦點。第18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報》與第11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論文研討會」都不約而同地以「區域文學」作為徵稿主題，獲稿頗豐。不同於在2000年左右的本土化浪潮中，「台灣主體性」成為學界亟欲建構的對象；在2014年的台灣文學研究場域上，「區域文學」雖然再度成為關注的焦點，然而其中對區域性、地方性等核心命題，則有更多是來自對結構性與方法學本身的省思。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波研究成果或許也能視為是1990年代以降台灣發展地方性文學的一個階段性總結。³

3 台灣學術界開始關注區域文學，始自1991年1月，由《文訊》對全台16縣市所做的《藝文與環境：台灣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實錄》；1993年，《文訊》在新聞局的贊助之下，舉辦6場區域文學會議，李瑞騰表示：「希望經由區域比較後得出共同與殊異的認知，整體匯合而成台灣文學的成果。」他並對「區域文學」下此定義：「區域是一個相對性概念。以世界為整體，則有亞太、歐美等區域性畫分；以台灣為整體，則整個島嶼可以畫分為許多大小區域，如中部、北部、南部、東部等，或者再細分，有北基宜、桃竹苗等地區……這個構想是在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後形成的，可說是前一計劃的深化，和各縣市在文建會指導下進行縣市籍作家資料的建檔，以及有計劃的出版作家作品集相互呼應。」九〇年代開始，台灣開始關注地方文學史料

其中，許俊雅的〈建構與新變／敞開與遮蔽——台灣區域文學史的意義與省思〉⁴針對台灣區域文學史的寫作進行回顧與展望，並重新對其進行界義與論述，是此批區域文學研究論文中較具方法學與研究視野的論文。許俊雅指出，由於受到全球化風潮的影響，變遷與移動不斷消解國土／地域的概念，尤其2010年新五都的產生，更衝擊到以縣市為基礎的區域文學書寫。而區域文學史的界義，也往往受到空間入史的優位性，反而對其自身的定義邊際產生游移。許俊雅認為，由於作家生活的變動，和知識結構的愈趨多元與更新，區域文學應被灌注進「流動性」、「開放性」與「交融性」的概念，並在寫作時引入文學場域與文化機制的生產概念，加強其論述上的能動性；而它與更大範疇的、或者在學院內更為「主流」的「台灣文學史」，二者的寫作之間，更應保持一條更為開放、互補的渠道，相互輸送文學研究的資源。

許俊雅的論文提示了一種關於區域文學史寫作的方法和策略。而黃憲作、陳惠齡等學者的論文，則示範了一種關於區域文學的當代研究典型。其中，黃憲作的〈花蓮文學的邊界——論花蓮文學的定義與花蓮文學史撰述的困境〉⁵有效地為我們展示了許俊雅所提示的那樣一種來自對區域「定義」上的困

與區域文學，包括地方作家作品集的出版、地方文學獎的林立、編修方志、地方文學史等工作。相關論述可見許俊雅的整理：許俊雅，〈建構與新變／敞開與遮蔽——台灣區域文學史的意義與省思〉，《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8期（4月），頁9-40。

4 同上。

5 黃憲作，〈花蓮文學的邊界——論花蓮文學的定義與花蓮文學史撰述的困境〉，《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8期，頁121-151。

難。作家的移動與旅居仍是造成區域文學定義曖昧的主要因素。黃憲作進一步質問：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地方性文學的存在是否還有其必要？強調地方性與地方文學的意義何在？這是花蓮文學史作為一區域文學史，在撰寫上必然要遭遇的困難。而區域文學未來的研究前景與發展究竟如何？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四、冷戰與文藝體制

2014年期刊平台上另一個最受矚目的焦點，是將台灣文學放置進冷戰體制的脈絡進行閱讀。「冷戰」意指1947年至1991年之間，由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分屬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美蘇兩國，各自擁有不同的社會與經濟體制，雙方及其盟國展開長達四十餘年的對峙狀態。而戰後的台灣由於受到美援文化的支持，自然也被納入冷戰體系的一環。其中，王梅香的論文〈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⁶有效地從歷史的角度，重返冷戰時期台灣美國新聞處的外譯工作。王梅香嘗試將台灣文學放置進文化冷戰的背景，指出美國新聞處透過譯書計畫（Book Translation Program）、中國報告計畫（China Reporting Program）、台灣報告計畫（Taiwan Reporting Program），將台灣文學推介到西方世界，其用意乃是为了要與共產中國的宣傳對抗，並是為了支持文化中國的正統性而展開。文中指出，美新處將台灣定位為東亞中文的主要閱讀市場之一，並積極尋求與在地

文學社群合作，推廣外譯叢書計畫。許多當時的新世代作家，甫在文壇初試啼聲，便被以英文譯介至東南亞，甚至登上世界文壇的舞台。這篇論文將1950年代後台灣文學在文化冷戰背景下所交綜的幾個因素，包括中國性（台灣性）、反共、現代性等命題，進行一種相互的演繹，並釐析了台灣文學外譯計畫中的政治性因素，以及「自由中國」在冷戰脈絡下的為美國所用的戰略位置。

王梅香的論文著力於討論冷戰中台灣文學向外的關係，並清楚地勾勒出「美國」作為其時台灣文學的「他者」身分。她的另一篇論文〈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⁷則將《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放置在美國新聞處的文化政策底下，指出兩本刊物的純文學取向，事實上皆有為美國進行反共宣傳的政治操作。而陳建忠與簡義明的論文，則處理冷戰與台灣文學書寫內部之間的影響關係。2014年，陳建忠發表了兩篇與冷戰有關的研究論文，其中，〈冷戰與戒嚴體制下的美學品味：論吳魯芹散文及其典律化問題〉⁸以吳魯芹散文為例，在「國家文藝體制」與「美援文藝體制」的政經文化脈絡下，試圖修正既有之非反共文學作家即「自由主義作家說」，以及「抒情散文美學主流說」，重新確立「閒適／幽默散文美學」，以及「知美／親美派的學者作家」這兩個現象與觀點。此篇論文的重要之處，即在於將吳魯芹放置在台灣戰後男性散

6 王梅香，〈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9期（10月），頁223-254。

7 王梅香，〈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台灣文學學報》25期（12月），頁69-100。

8 陳建忠，〈冷戰與戒嚴體制下的美學品味：論吳魯芹散文及其典律化問題〉，《台灣文學研究集刊》16期（8月），頁83-103。

文史的脈絡下，引匯進冷戰時期國家文藝體制與美援文化的因素，建立了男性散文「閒適」、「幽默」等主流美學品味。

小說家李渝於5月過世，象徵著保釣世代的逐漸殞落。簡義明〈冷戰時期台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以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為線索〉，⁹則以郭松棻發表於1974年香港《抖擻》雜誌的〈談談台灣的文學〉作為進路，將海外保釣一代人流動於香港、台灣與北美等地，在香港文藝雜誌、海外保釣運動論述、1970年代台灣的現代詩及鄉土文學論戰等三地的知識連結中，進行一種辯證性的考察。論文認為，在冷戰的知識背景底下，應打開保釣論述的疆界，將香港回歸的論述與台灣現實主義論述，當作相互影響與流動的整體來思考。

五、離散、移動、空間

離散研究是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長期以來關注的議題。它與作家生命經驗的移動往往相關。2014年的離散文學研究較具份量的，有侯如綺的專書《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1950-1987）》。¹⁰此書討論的作家橫跨37年，非但形構了戰後初期台灣、正統中國與共產黨之間的重層牽制關係，對外省族群的流亡史、生活處境、時代課題與心理情境，也有深刻詳實的討論與對話。

在期刊論文方面，劉秀美〈位移的南

方，想像的鄉愁——張系國七〇年代小說中的故土想像〉，¹¹則以張系國作為個案，他在1970年代創作的《棋王》、《昨日之怒》引發了一些重要的文學與文化論述。張系國長年居住海外，始終認為自己是生根於台灣的中國人。而作為「擬流亡心態」的外省第二代，相較於大陸，在地理位置上位居南部的台灣，其空間意義則成為他連結故土的精神寄寓所在。此文基本上延續著近年學術界對離散作家的討論，「空間」再度成為離散者展示想像與精神圖像的所在地。

另外，王鈺婷〈離散與家國之間：論張讓散文中跨界經驗與「局外人」身分〉¹²也值得一讀。此文以長年旅居海外的張讓散文作為討論對象，指出張讓旅美後的散文往往是以台灣鄉土經驗嫁接異國的廣漠，在美國的地域中再現台灣與中國鄉土，並以局外人的身分，拆解美國神話與批判其物質文明。王鈺婷認為，張讓的離散經驗介於根（roots）與路（routes）之間，與台灣／美國兩個中心對話。在相異文化群體的跨界經驗中，她以第三者身分進行反思，對中西文化現象、離散文化與自身定位，都有深刻的思考。

在王鈺婷的離散論述中，地域、空間的再現，仍是討論的重心。而2014年有關空間研究的論述，相較於前幾年，本年度所展現的研究成果，有更多是關於空間研究與其他主題的應用結合。其中由陳芳明主編的《殖

9 簡義明，〈冷戰時期台港文藝思潮的形構與傳播——以郭松棻〈談談台灣的文學〉為線索〉，《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8期，頁207-240。

10 侯如綺，《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1950-1987）》（台北：聯經出版公司，6月）。

11 劉秀美，〈位移的南方，想像的鄉愁——張系國七〇年代小說中的故土想像〉，《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8期，頁241-260。

12 王鈺婷，〈離散與家國之間：論張讓散文中跨界經驗與「局外人」身分〉，《文史台灣學報》8期（6月），頁53-74。

民地與都市》¹³即是一部看似以城市空間為經緯，事實上將研究重心瞄準不同城市時差下的「現代性」專書。此書收錄郝譽翔、吳佩珍、邱雅芳、崔末順、劉正忠、王婉容、王君琦、紀大偉8位學者的論文，論述主題涵括日治乃至戰後，空間跨幅包括上海、台北、東京、首爾，以城市空間及作家的流動作為現代性論述開展的場域。陳芳明指出，都市的誕生，是現代性最具體的呈現。在東亞地區，各個城市所彰顯的現代性精神與內容，都具有顯著的差異。日本代表著帝國的現代性，中國上海意味著租借地現代性，而韓國首爾與台灣台北則呈現了殖民地現代性。8篇論文分別從這四個城市及其所承載、開展的文本，拓落出一幅東亞城市的現代性景觀。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此書中的「空間」雖明指四個城市，然細察編者的思維路徑，不難發現其中所欲建構的一個更為巨型的空間，應其實是「東亞」。

將空間研究與現代性進行更為活潑的結合，是蘇碩斌的〈旅行文學之誕生：試論台灣現代觀光社會的觀看與表達〉。¹⁴此文將旅行文學放置在1990年代開放觀光後的台灣社會，指出「旅行文學」這一文類，乃是為了與觀光社會的視角進行區別，抗拒「旅行平庸化」的一種文學鬥爭。蘇碩斌指出，這種當代的旅行文學要求一種獨特的內在凝視，並要求外在的寫實描述；旅行者必須擔負「發現風景」、並進而在風景中形塑具有孤絕感的個人性「主體／客體」關係。

13 郝譽翔等著，陳芳明主編，《殖民地與都市》（台北：政大出版社，11月）。

14 蘇碩斌，〈旅行文學之誕生：試論台灣現代觀光社會的觀看與表達〉，《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9期，頁255-286。

六、女性文學研究

2014年的女性文學研究，以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分別於5月出版的洪淑苓《思想的裙角——台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銘刻與時空書寫》與11月出版的桑梓蘭《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兩本專書較具份量。其中，在《思想的裙角》一書，洪淑苓以胡品清、林泠、朵思、夏虹、蓉子、陳秀喜、杜潘芳格以及羅英8位台灣女詩人作為探討對象，書名取自林泠詩句——正如林泠的提示，當風吹動「思想的裙角」，我們如何解讀揚掛在枝頭的重重綠意，以及那「多枝節」的象徵？洪淑苓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台灣學術界運用女性主義進行文學批評的風氣大為興盛，形成重新解讀女作家、建構女性文學史，甚至重建文學史的意識與挑戰。本書便是針對這股潮流的回應與突破，以自我形象、時空意識和生死書寫為三大主軸，一方面挖掘女詩人的女性自我，另方面則從詩學主題立論，以此肯定女性詩學的多維向度，並凸顯女詩人的個別成就。」

相較於洪淑苓的女性研究著重於女性詩學的意象表徵，凸顯女性主體，桑梓蘭的《浮現中的女同性戀》則對現代中國的女同志族群進行一種具歷史性視野的考察。此書雖然四分之三的篇幅皆在勾勒現代前後「中國」女同性戀圖像，然而第四部分「解嚴後的台灣」分兩章〈媒體化公共領域中的女同性戀運動〉、〈女同性戀的自傳式書寫〉為解嚴後的台灣女同志運動勾勒出一幅脈絡化的景象，是近年來女同志議題暫歇後的台灣文學研究場域上，少數關注的聲音。

女性文學的單篇期刊，以王鈺婷〈代

言、協商與認同——五〇年代女性文學中台籍家務勞動者的文本再現》¹⁵最具可讀性。此文的題目也相當有趣。根據王鈺婷的說法，家庭勞務幫傭工作在台灣社會存在已久，尤其在五〇年代，有許多文化與社經背景較為優越的外省女性，把家庭勞務工作轉移給經濟較為弱勢的台籍女性。王鈺婷此文嘗試把性別、階級、族群三者交錯的網絡代入五〇年代的女性文學研究之中，進而發現這些幫傭的台籍女性往往必須透過外省籍女作家的筆下，才能再現自己。此文也是本年度少數動用理論來進行論述的論文，她引用史碧娃克所提出的底層論述，討論外省籍女性作家如謝冰瑩、葉蟬貞、徐鍾珮、鍾梅音等以家務勞動者為主題的代表性作品。其中涉及性別、階級與再現的問題。

七、文學批評

2013年，兩位「新批評」的大家顏元叔與夏志清分別於年初與年末過世，留給台灣現代文學批評界彌足珍貴的學術遺產。2013年《文訊》2月號即推出「有遠見的開創者：紀念顏元叔教授」專輯，邀請胡耀恆、彭鏡禧、呂正惠、張瑞芬4位教授撰稿，對顏元叔生前所從事的編譯與論述工作，進行了系列性的回顧。而學術界對顏元叔影響台灣現代文學批評最深的「新批評」方法的論述，在2014年，有林巾力〈新批評與現代詩：以顏元叔為聚焦〉。¹⁶此文嘗試在現代詩的批評

方法中為「新批評」尋找到一個位置。林巾力指出，早期的現代詩多半以印象式批評為主，第一個講求完備並具方法學論述的，是六〇年代由顏元叔提出的新批評，並在七〇年代逐漸獲得文壇主流的批評位置。然而隨著社會文化的日趨複雜、現實視野的拓展，以及紛繁多樣的理論進入了台灣文學研究的場域，新批評的方法逐漸失去主導性位置。然而在文學教育的體制之中，尤其在現代詩的批評場域上，卻仍可看到新批評根深蒂固的影響痕跡。此文非但整理了五、六〇年代英美新批評在台灣傳播的軌跡，也對顏元叔的新批評在實踐過程中的變化與適應，提出了極具前瞻性的看法。林巾力此文的結論尤具可讀性。文中指出，一般來說，顏元叔的「新批評」常被視為是與台灣現代主義攜手並進的，然而在顏元叔重理論、邏輯與論述的傾向中，可以發現顏所引進台灣的「新批評」，事實上對現代主義是批判多於認同的。林文認為，顏元叔引進新批評的企圖有二：其一是為了跳脫印象式批評的傳統上，過於重視歷史傳記的外緣批評，藉此將文學內部的美學結構提升為批評的重點；其二是由於當時現代詩的晦澀難懂，希望藉由新批評破除語言的形式與迷障，並建立一套鑑賞好詩與壞詩的方法。然而在引進的過程中，由於顏元叔本人的許多理念與喜好，使得這套理論在台灣傳播與深化的同時，也有過於強化某些論點的傾向。林巾力認為，或許可以將這種轉化視為是理論家嘗試超越新批評限制的一種努力。

15 王鈺婷，〈代言、協商與認同——五〇年代女性文學中台籍家務勞動者的文本再現〉，《成大中文學報》46期（9月），頁245-270。

16 林巾力，〈新批評與現代詩——以顏元叔為聚焦〉，《台灣文學研究集刊》15期（2月），頁123-153。

八、小結

綜觀2014年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可以發現「跨域」幾乎是所有研究議題的聚焦所在。無論是區域研究所訴求的區域性、在地性，抑或是在冷戰體制的研究中，嘗試構築出冷戰時期東亞與美國等區域之間的連結與影響，甚或是殖民地空間中的現代性研究，離散與移動等命題，都具有一種跨越區域界線、探索域外他者的途徑可循。也可以看到近幾年來各研究領域的學者都嘗試在自身所關注的領域內，藉由移動、遷徙等空間性的外擴特質，將研究領域本身的空間拓寬，以開發新命題的可能。冷戰體制與東亞研究，都是這樣的路數——不再侷限於單一作者抑或命題的討論，而是朝向一種更為龐大的體系（政治的、社會的、思想的、經濟體的）接軌。而近年受到關注的「華語系文學」研究，2014年是相對沉寂的一年，要到2015年的《中外文學》，才有較具份量與開展性的研究成果發表。在論述的展開方面，和前幾年相比，理論的運用明顯地減縮了，取而代之的是實際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等歷史因素的影響作用被凸顯了，媒介、傳播方式等載體的效用也被強調了。可見近幾年來台灣文學研究經常討論是否需要「理論」，這一方法上的質疑，其實也緩慢地發生在書寫的操作上。